

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

《紅日》研究專集

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
《紅日》研究专集

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編

一九七九年十月

前 言

(一)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》是参加协作编写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、科研内部参考用书。

(二)参加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》协作编写的单位有：山东大学、山东师院、广西师院、上海师大、上海戏剧学院、辽宁大学、四川大学、安徽大学、安徽师大、华中师院、江苏师院、扬州师院、沈阳师院、河北师大、杭州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南京师院、浙江师院、徐州师院、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。

(三)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》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。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：

《中国当代作家小传》(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)。

马烽、巴金、王汶石、王愿坚、艾芜、田间、老舍、冰心、刘白羽、孙犁、沙汀、李季、李准、杜鹏程、陈残云、张天翼、周立波、周而复、杨沫、杨朔、玛拉沁夫、欧阳山、贺敬之、胡可、草明、柳青、闻捷、赵树理、姚雪垠、徐迟、秦牧、峻青、茹志鹃、夏衍、郭沫若、郭小川、郭风与何为、梁斌、曹禺、臧克家、魏巍等作家研究专集。

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》、《天安门诗抄》、《于无声处》、《丹心谱》、《甲午风云》、《江姐》、《刘三姐》、《红岩》、《红日》、《林则徐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

《杨开慧》、《阿诗玛》、新民歌、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、
《豹子湾战斗》等作品研究专集。

(四)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》的各专集，一般包括下列内容：

(一)作家传略

(二)作家的生活与创作

(三)评介文章选辑

(四)作家著作目录、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

(五)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辞，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，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，对此，我们表示衷心感谢！

(六)本专集由上海师大中文系王训昭同志负责编选，在编选印刷过程中，该系七七届学生三人曾参加过编选工作，资料室作了大量工作。

(七)由于水平所限，时间仓促，错误缺点难免，请予批评指正。

一九七九年四月

目 录

一、吴强小传.....	(1)
二、吴强谈创作经验和体会.....	(3)
写作《红日》的几点感受.....	(3)
漫谈写小说(节选).....	(11)
《红日》修订本序言.....	(12)
写作《红日》的情况和一些体会.....	(17)
运用形象思维的一点体会 ——写在 学习《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》以后	(43)
谈《红日》的创作体会.....	(48)
《红日》二次修订本前言.....	(58)
三、《红日》评论文章选辑.....	(64)
孟良崮战役的参加者谈《红日》 ——《红日》座谈会记录摘要	晓钟整理 (64)
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(节选)	何其芳 (75)
革命的战歌、英雄的颂歌 ——略论《红日》的成就及其弱点	冯 牧 (78)

《红日》所体现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	平 凡	(90)
一幅动人的战争油画		
——评吴强长篇小说《红日》	宁 干	(97)
评《红日》	罗 荪	(102)
《红日》试析(节选)	刘 金	(120)
谈《红日》的人物描写	万 千	(158)
《红日》的人物	石 言	(160)
喜读《红日》	齐 鲁	(168)
论《红日》(节选)	丝 鸟	(180)
浅谈《红日》的艺术特色	胡若定	(191)
革命战争的乐章(节选)	崔左夫	(199)

四、吴强著作目录和《红日》评论文章篇目索引

吴强著作目录索引	(200)
《红日》评论文章篇目索引	(205)

一、吴 强 小 传

当代著名作家。曾用笔名吴蔷、叶如桐。1910年2月生于江苏涟水县高沟镇一个贫苦的家庭。1918年在本镇读小学，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，便到外地读收费低廉的师范学校，之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由初中到高中，又读到大学。此间曾几次辍学，做过酒店学徒工和小学教师。青年时期爱好文学艺术，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散文、特写和短篇小说。1933年春，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先后发表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说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于1938年在皖南参加新四军，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部队先后担任过新四军军政治部的宣传部文艺工作干事、科长和纵队（军）、兵团政治部的宣传部长等职务，全国解放后，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，并从事业余创作，写过短篇小说《激流下》，散文《夜行》，《老黑马》等，发表于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等刊物。此外，还写过独幕话剧《一条战线》、《激变》等，并与人合写了三幕话剧《繁昌之战》和《丁赞亨》，都是取材于抗日斗争，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火热斗争生活的。《丁赞亨》于1946年由华中韬奋书店出版，1959年改名为《逮捕》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。《繁昌之战》在部队演出多场，影响很大，对新四军的话剧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在解放战争中，他亲身参加了莱芜、孟良崮、淮海、渡江等著名战役，许多英雄事迹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1949年6月他执笔与宋洁合作写了

短篇小说《三战三捷》，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上，195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散文《英雄的业绩》（后改名淮海前线纪事）同年在上海出版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于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，先后在华东文化部、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、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负责文艺工作，曾任华东文联党组成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代理党组书记、副主席、中国作协理事等职。1953年和1954年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个中篇小说《他高高举起雪亮的小马枪》和《养马的人》。经过长期的酝酿，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创作了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由弱到强，最后取得胜利，并揭示了人民战争的规律，形象地体现了毛主席军事思想伟大胜利的优秀长篇小说《红日》（1957年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）。在这部小说里，作者通过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，塑造了从军长到战士众多的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，描写了规模宏大的战斗场景，对国民党反共将领的顽固、毒辣、阴险、狡猾、色厉内荏的特点，也都写得维妙维肖，入木三分。在1960年7月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，周扬和茅盾在报告中，都曾指出《红日》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特点和成就。他这部代表作，在1959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版，并于1962年拍成电影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。继《红日》之后，作者于1961年开始了以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为题材的长篇《堡垒》的写作，到1963年完成了全篇的大部，部分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解放军文艺》、《上海文学》选载。其它作品有评论集《文化生活》（1960年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）和小说散文集《心潮集》（1963年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）等。

（录自《中国文学家辞典·现代第一分册》，北京语言学院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编委会）

二、吴强谈创作经验和体会

写作《红日》的几点感受

在我的感觉里，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战斗、战役，都有感人的、生动的内容、精密的结构和鲜明的风格，许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和生活情景，常在我的脑子里活动，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就想写点什么，但总觉得自己的政治根柢，艺术根柢都太浅薄，特别是接触巨大的战争生活题材，表现敌我斗争的重大主题，一拿起笔来，就胆怯得很。

全国解放以后，写作的内心冲动，更强烈了。有一种欠了债急需还债的感觉。经过了一个时期的思考，在1952年的秋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写好了《红日》的故事梗概和人物表。

为了练笔，也为了创作思想上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，我便在1953、1954两年，先后写了两个中篇小说，作为写《红日》的创作准备。

以后，文艺界对胡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文艺思想的批判，关于“写英雄可不可以写缺点”等问题的讨论，又读了几本中国的、外国的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，启发了我的创作思想，激动了我的创作要求，也进一步地增强了我的创作干劲。虽然觉得创作准备还不充分，但决心不再延迟、观望了。在获得组织上给予的假期之后，就在1956年的春夏之交，进入了《红日》创作的第二阶段，把先前拟好的故事梗概作了一番修

改，便开始动笔了。

在实际写作的过程里，思想问题还是很多，有的解决了，有的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恰当、不明确。

故事的主线是敌我斗争。在这个主线之下，写我军内部的思想矛盾（但不作为一条副线），在进入写作之前，我的思想观念是明确的、肯定的。至于内部矛盾怎样表现，表现到什么程度，却胸无成竹。原打算把团政治处主任潘文藻写成对消极情绪严重的人物，作为刘胜积极歼敌思想的对立面，使他成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代表人物，和工农出身的代表人物刘胜、以及同样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代表人物陈坚互相对照，并在生活发展的过程里，通过陈坚、刘胜和他的思想斗争，给予批判，最后端正他的思想倾向。初稿写成以后，发现对这个人物写得不实、不深，和陈坚、刘胜的思想对立也不明确，不尖锐，就又把在他身上突出的消极部分删掉，并且在孟良崮战役里加写了他的一些积极的表现。这就把矛盾的对立面在实际上取消了。陈坚和刘胜的思想矛盾写了几处，但因矛盾的内在方面没有充分揭示，因而斗争也没有展开。在沙河边上打马家桥的问题上，是陈、刘思想冲突的契机，我也没有抓住。此外也还写了一些上级和下级的、干部和战士的、战士和战士之间的思想、性格冲突，但都是片断的、零星的，不贯串也不集中。

写内部矛盾心中无数，直接限制了许多人物形象的塑造。潘文藻的性格、面貌模糊；陈坚这个政治委员的作用不太显著，形象缺乏光彩；军政治委员丁元善着笔少而无声无色，显示不出他在政治思想领导上的威力；连指导员罗光写的也不够突出，都来自这个原因。许多政治工作干部、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，在战争生活中有出色的表现，我也有比较深刻的印象，

实在是可以大写多写的。按照战争生活的实际，政治委员的主要作用，是表现在政治思想、军事思想的领导上和掌握贯彻党的方针、政策上，政治工作人员的主要作用，是通过政治工作保证部队任务的彻底完成。矛盾、冲突不展开，斗争不尖锐化、突出化，要显露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作用，突出他们的精神面貌，就抓不到重要环节。因为集中于写对敌作战，写军事活动，因而人物的描写更多的落笔在军事干部和战士们的身上，丁元善、陈坚、潘文藻、罗光等较之沈振新、刘胜、石东根既弱而又缺乏光彩，便是自然之势了。

在人民解放军里十多年的工作阅历，使我有了一点进行创作的生活底子，但底子不厚，生活的真实感受、经历不深不广，这在作品里也有明显的反映。我在第五章里写了葛成言、葛老大娘；在第八章里写了一个妇女捉俘虏的故事；在第十二章里又写了陶二嫂（还曾经企图写陶二嫂同受了伤的丈夫），写这些人物的目的是为了表现人民群众对我军作战的支援、配合以显示解放战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。但我没有能够如愿地表现出来。在众多的人物里，没有一个群众人物给人以比较深刻的印象。写敌我两军斗争的头绪已经很多，再着重刻划群众中代表人物的形象，有点照顾不了，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，主要的、也是根本的原因，乃是对群众经过土地改革的严重斗争，支援、配合部队作战方面，缺乏生活的具体实践和真实感受。

有同志说，《红日》里的爱情可以不写。我以为这个意见是深刻的。我设想过：如果故事里的爱情部分不写，把笔墨移用到其他情节和人物的描写方面，获得比写了爱情要好一些的思想、艺术效果，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无疑的。但这并不等于说爱情不可以写，爱情在战争生活中是存在的，而且是与战争

生活联系着的。问题在于我写得成分多了，有些地方且没有写好。照现状看来，象黎青这个人物，不妨割爱。她在战争生活中未见起到什么独立作用，对沈振新的形象也并未增添多少光彩。对于华静，我是把她当作一个地方工作干部写的，并不是专为梁波而设计的。按照这个写作意图，就应该对她做党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生活多写一点，对她的个人生活部分少写一点，使人感觉到她是战争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，但现在的情况，是她爱情活动写得多了，特别是在沙河边上的深夜里给梁波写信的一段，既浪费了笔墨，又带来降低人物气质、风格的反效果。

在完成艰巨的战争任务的过程里，部队里的女战士们和妇女群众是起了重大作用的。要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战争生活，就得用相当的篇幅表现她们，这是在设计故事的开始，思想上就明确了。书里所表现的状况怎样呢？她们的思想行动与战争生活有联系，也写出了华静、黎青、姚月琴等等对解放战争的一些贡献，但我在生活中没有给她们一个确定的地位，给了确定的地位之后，又没有在首先表现她们对战争任务的作用的前提下，写她们的爱情生活，象写沈振新、梁波、杨军那样。姚月琴、钱阿菊如此，华静也如此，黎青几乎完全成了附属于沈振新的人物。有些同志感觉到有些关于爱情生活的描写“有附加的嫌疑”，是言之有据有理的。

在写我军干部、战士对蒋匪军74师的敌视观念方面，较多地集中在涟水一战的仇恨情绪上，表现的思想角度，显得狭隘了些，对工农军队的伟大胸怀和革命英雄气概，就未能在显示共产主义战士的精神世界的基础上，鲜明强烈地突现出来。在这一点上，表现为拘泥于某些人物思想的本来面目，没有在

真实生活的基础上，加以适当的提高，赋予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色彩。

在语言方面，我企图使人物的说话，能够适合人物的身份、水平、性格，运用生活里通行的语言，剔除其中的糟粕部分，求得既能表达思想感情，又能保持语言的纯洁、健康。可是，心余力拙，做的很不到家。在通过作者自己的语言描写人物、风景事件的时候，就暴露了更多的缺点。语法不通，词藻陈旧、冗长，倒装的欧化句子也很多，初稿完成以后，曾修改过不只千百处，出版后，又曾作过几次加工。现在来看语言文字不顺、不通、不纯的地方还有不少。我对整顿文风，学习群众语言，注意语言的准确性、鲜明性、生动性不曾下过认真的工夫，是表现得很明显的。

作品和我在写作上所存在的缺点，绝不只是上述的一些。

战士们的脚步，从涟水城下，走到山东，经过莱芜大战，到取得孟良崮战役的光辉胜利，是血写的一部战争生活的史诗，我用墨在《红日》里所反映的，只不过是苍海一粟，在写作之前，我曾经因为未能尽到应尽的责任，感到不安；写成之后，发觉作品存在有许多缺陷，我不禁又感到新的不安。

《红日》的创作过程，就是我的学习和锻炼过程，创作的感受，主要有下面几点：

一、我在动笔之前，就得到了党的组织和许多同志的鼓舞和支持，我是带着兴奋、激动、喜悦的心情起步向前的。动笔前后，在参考史料方面，从有关的部门和同志们那里迅速地得到了满足。我所遇到的同志，无不关怀我的写作进度，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。初稿完成以后，好些同志在三两天的时间里，就看完了将近四十多万字的打印稿本，认真地给我提出了意

见。现在的第十章（写后方医院生活的），就是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改写了的；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（写孟良崮战役的），也是经过同志们的座谈，给我提了意见，有些地方作了重大修改，有些地方是完全重写了的。在初稿里，刘胜写的不够，有些同志认为这个人物是书中人物的一个主干，需要加强，我觉得很对，便在某些章节里，加进了一些关于刘胜的描写。一位领导同志特地跟我谈了一次话，指示我不能把敌人写到软弱无能，他说：“在实战当中不能轻敌，在写敌我斗争的时候，同样地不能轻敌。事实上，我们的敌人有长期的反革命战争经验和强大的兵力，我们的胜利绝不是轻易取得的。”关于张小甫的描写，我就是在这个启示之下，又增加了不少笔墨的。总之，我是在对我关怀、帮助的浓郁的气氛里进行创作的，没有这个促进的条件，《红日》的出世定要带着更多更大的缺点。这使我得到前进的热力，我感到愉快和幸福。

二、与其说我创造了人物形象，倒不如说我是跟着人物走的。沈振新夜审俘虏张小甫，批评刘胜的骄傲情绪以后，把自己的夹绒大衣送给刘胜；在孟良崮战事紧急的时候，离开指挥所走向战斗最前线，都是他的性格要求。石东根在莱芜大捷以后醉酒纵马，受了批评以后，上缴手表等战利品，发誓戒酒，在部队转移到鲁南敌后的路上，因为心情苦恼，又吃了老大爷家的一杯酒，在孟良崮高峰下面中了硫磺弹，烧坏衣服，赤膊上阵；梅福如为杨军夫妻成全喜事，杨军要阿菊为秦守本等赶做了三双鞋子；姚月琴不愿离开前方的战斗生活，与胡克暂时剪断了爱情关系；秦守本对王茂生态度不好，深夜里在雁翅峰上放哨的时候，又谈起心来，打破了感情隔阂；华静跳上梁波的木筏渡过沙河，把她的信交给梁波；刘胜因为自己的部队当

了预备队，闯到师指挥所表示不满，受了批评，回到团部对陈坚说：“给副军长狠狠地上了我一课”，……这也都是人物自己的思想行动。我以为一个作者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图去随意支配人物，作者的意图必须和人物的内心愿望相一致。我这样觉得，当我的自由权利和人物的性格要求统一的时候，我的笔触和我的心情才顺畅如流。如果与这种情境相反，不是由作者按照生活规律赋给人物以性格，而又根据人物的性格的规律去表现人物，就是说，让作者的自由限制了、侵犯了人物的自由，随意地支配了人物的思想行动。那就必然使客观的存在为作者的主观意念所代替。华静在深夜里给梁波写信，思念梁波，是华静自己的感情行动；但在那封信上化了那么多心力，把写好的信折成个八角形的花瓣儿，就不是当时情况下的华静要我那样写的，而是我强要华静那样做的了。这只是一个例子，如果仔细检阅一番，在其他人物身上，定当还有类似的情况。作者写书，要对读者负责，但应当最先对所写的人物负责，尊重人物的自由，而不应当对人物有丝毫的委曲；任情摆布，是更不许可的。

三、在开头，我说到我面对巨大的战争生活题材，思想上曾经有过动摇，不敢想也不敢写。在动笔以后，对作品规模的设想，我也是动摇的。最初，我只打算写25万字左右，分12章，但当生活图景在笔下展开，人物涌现出来以后，觉得40万字也难以写完。但我担心大了收不拢，长了不紧凑，因此，决定精简、压缩。但必须写的人物活动，应当发展的故事情节，也都给约束住了。作品应当力避冗长芜杂，力求精炼，但不能不服从艺术表现的实际需要。这一点，我没有正确掌握，以致削足适履，使有些人物没有能够得到充分而适当的表现。

我也曾经考虑到在莱芜战役以前，插写一段峰枣战役；在莱芜战役以后，插写一段泰安之战，都由于这个缘故，把这两个战役放到背后去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两段不正面写是可以的，但还应该再增加一些篇幅，把几个主要人物多写几笔。

四、在战斗里，火线上怎样写人物的问题，我还没有捉摸到足以自信的表现方法。写战斗，绝不能只是放枪、打炮、拼刺刀冲锋、呐喊。事实上，每个战士在放枪、打炮、拼刺刀的时候，也是有思想、有感情、有精神活动的，那当儿的精神活动，比平时集中，如果单纯写事实，说什么思想都没有，那就把战斗中的人当成了活动的工具，显然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。写了人在战斗里的精神活动和外部表现，又能不松弛战斗进行的紧张气氛，我感到是一个难题，并且企图解决这个难题，可是没有解决得好。这也使有些人物在战前战后还比较活跃，还能够多少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，一到上的火线，打响了枪、炮，人物的精神活动便展不开了。我在第一章里写了杨军，一直搞到第十章才又叫他出现，本来打算让他到孟良崮战役里大露头角，显现他的英雄气概，就是由于在战斗中写人的无能，对杨军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，便未能达到我所预期的效果。对石东根、秦守本等也是一样，在战场上的描写就比在战前战后写得更不充分。在写作过程里，我在这一点上是感到苦恼的。

文学作品通过一个作者的笔写了出来，绝不等于作者个人的独力创造。首先作品所反映的是客观生活的存在，没有涟水、莱芜，孟良崮等等战事，没有广大军民的战争活动，我是无能为力的，《红日》的产生，也是不可想像的。在写作之前的思考过程里，在动笔写作的过程里，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、我所接触到的许多同志和他人的作品和经验、意见，都是我进

行创作活动不可缺少的条件，离开这些条件，我同样无能为力的。在作品完成、出版以后，领导上和许多同志、读者，热情地关怀我，给我鼓励、批评，参加过涟水、莱芜、孟良崮战役的战友们还特地开了一个座谈会，提出了很多恳切正确的意见，促使我正视作品的缺点，接受这次写作的经验教训，推动我继续前进。这种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有的真诚的爱，深深地感动着我，同时也使我更明确地体会到：一个作品绝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劳动的成果。

——选自《文艺报》，1958年第19期。

漫谈写小说（节选）

我在写“红日”以前，没有写过长篇。我准备的时间比较长，解放战争时期我就有写作的意思，因为战役，没有工夫，心也定不下来。解放战争结束以来，从1949年到1952年，这几年我都想写。那段时间中我进行了构思，写了提纲、人物表、故事，把我自己所能够记忆到的一些事情全部回忆过来，写在本子上。把许多素材经过整理，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有几万字的故事提纲。后来我觉得写这么一部长篇没有把握，开了几次头，总有一点胆怯心虚，就决定写些短的，做做练习，写了两三个中篇小说，也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。写了之后，给大家看看，提提意见，自己也看看改改，发表了，这样就多少有了一点信心，胆也壮了，自己笔下写的也顺利些